

西藏社会稳定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孙 勇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拉萨, 850000)

内容摘要: 西藏社会的稳定关系到国家的安全与稳定, 无论从事藏学的何种学科研究, 都需要对西藏的社会能不能稳定这一问题加以关注。西藏社会如何才能达到长久治安? 需要“谋长久之策, 行固本之举”, 如何才能这做到这一点? 需要实行集成式的、高度综合的研究, 建立“边疆学”, 以新边疆、大战略的思维, 树立起大边疆的战略, 把地缘政治学、政治地理学作为这个学科群的核心, 以统领所有能够为中华民族长远利益和伟大复兴而崛起的这一历史过程而服务的学科。

关键词: 西藏社会 稳定 边疆学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 西藏拉萨发生了“3·14”事件之后、四川阿坝发生了“3·16”事件, 与此相差不多的时间内, 在青海、甘肃等地也发生了大小规模不等的暴力犯罪事件。这一系列事件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达赖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有组织有预谋地, 在长期实施了渗透和分化之后, 一定会在某个他们认为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场合发难。人们将眼光再向前看, 中国西藏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上百起的骚乱事件, 这在世界各国都是很少见的, 在3年的时间内发生上百起骚乱事件, 且未得到平息, 是旷世少见, 如果说这上百起骚乱事件发生在东欧解体, 南斯拉夫分裂的情况下, 尚可讲有道理可讲, 但是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在努力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当中, 发生上百起骚乱事件, 可以说是匪夷所思; 再向前追溯, 20世纪60年代末, 西藏也发生了局部的官方定义的反革命暴乱事件, 即以尼木县为中心, 并波及其他县, “文化大革命”后期发生了打死解放军, 打死国家工作人员, 破坏国家财产和交通设施的一系列事件; 再往前看, 50年代末西藏发生全面武装叛乱, 从1959年3月开始, 经历了长达三四年的时间才得以完全平息, 正式报道3天平息叛乱, 指的是在拉萨市内叛乱被平息, 而在整个西藏自治区境内和康区等地, 大约花了四年的时间才得以全面平息。这一系列事件有其内在历史连续性, 这就引出了必须认真考虑的藏区社会长期稳定的问题, 这个重大的问题由胡锦涛主席点出, 即“谋长久之策, 行固本之举”。在2009年3月10日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代表大会西藏代表团的审议时, 胡主席点出, 西藏社会要达到长治久安, 需要“谋长久之策, 行固本之举”, 这显然是关乎国策的重大问题, 它点明了西藏的社会需要长期的稳定。这个长期稳定的命题, 与我党在十

六大、十七大提出的即十七大的副标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关。中共中央提出的这一伟大历史任务，包含着全国的各个民族必须围绕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这一命题。西藏社会的长期稳定都应该围绕这样一个伟大的、长远的历史任务而进行研究，这项研究的着眼点和入手处应当在哪里，应该是每一个对藏学研究感兴趣的学者们都会思索的问题。其实，无论是从事藏学的何种学科研究，学者们都对西藏的社会能不能和谐即稳定的问题加以关注。

一段时间以来，怎样“谋长久之策，行固本之举”，许多专家学者从各自不同角度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笔者对最近一年各种出版物中的主要观点，初步归纳有以下几种：一是构建和谐社会说；二是加快经济发展说；三是做好民族工作说；四是抓好宗教事务说；五是加强社区管理说。这些观点有的围绕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来破解西藏社会长期稳定、保持稳定、促进稳定这一中心命题；有些专门从加快经济发展来破题，认为发展是硬道理，只要发展了所有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有人认为做好民族工作才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因为民族团结搞不好，西藏社会就不会稳定；有的观点认为西藏全民信教，宗教事务管理不好，民族工作做不好，和谐社会构建不了，经济加快发展就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也有学者从推行法制建设、加强社区管理等，甚至从个案上寻找全面治理西藏社会的答案。这些论述，有些出自长期在西藏工作的干部之手，有着丰厚的基础工作经验；有些是由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提出，他们均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来。但经过一年多的实践，笔者感到现在以及今后的研究需要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高度的综合，进行跨学科的研究，要在跨学科的研究中完成“谋长久之策，行固本之举”这样一个重大命题。

我国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如果对应于国际藏学界对我国西藏和四省藏区的研究而言，做得很不够。曾有人问“我国和美国藏学界的区别在哪里”？一般而言，我国的藏学界是为了学术而进行学科研究，完善自己进入藏学界的某一具体学科的知识是学者们追求的目标，而美国的藏学界是为了国策，是为了国家最高利益而进行学术研究，这是我国藏学界与美国藏学界的本质区别。美国的藏学界所覆盖领域非常广，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语言、历史、地理、人类学、民族学、法学等，美国的藏学界中甚至有数学研究人员，美国藏学界覆盖了所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精英，对西藏问题进行研究，而且在研究中，许多学者可以担负起跨学科研究的重任。如梅·戈尔斯坦，就横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综合研究。我认为，对西藏社会稳定这样的一个重大命题，如果要进行跨学科研究，应当有一个学科来统领，而这个学科可能是在建的学科，就是“大边疆战略学科”，或称为“边疆学学科”，即以大边疆战略思维来综合各有关学科，实行集成研究。这个研究的思路是：

西藏社会的稳定问题，在藏学界，无论是在哪个学科，即便是考古学研究也和西藏社会稳定有关系，无非是直接或间接的程度不同而已。因为文化是西藏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文化是各民族间认同程度的标志，如龙符号的文化含义，肯定要通过考古学的研究，可以远溯至上千年。在藏文化中，龙符号也是非常久远的符号，应和汉族有关。西藏社会稳定的问题是中国边疆治理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中最根本的是当代国家边疆战略的问题。我们已有一个常识，我国自古以来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国家边疆的稳定就是国家社会整体稳定的重要部分，维护边疆稳定是历届中央政府密切关注并高度重视筹边政策与对

策的重要内容。民国以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更加重视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问题,将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与中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有机结合起来,置于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毛主席曾强调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的基本保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处理边疆地区稳定的问题上,总体上是成功的。但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各国社会稳定都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之后,全球性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日益突出,连欧美国家亦未能幸免,甚至是世界头号大国也生活在担忧之中,就是因为民族、宗教问题所带来的困扰。

在我国,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三股势力活动猖獗,直接侵害到我国许多地区,尤其是边疆地区,因此维护我国边疆地区稳定的问题被中央提高到非常的高度,维护西藏地区的社会稳定实际上就是国家治理边疆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命题。西藏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具有特殊性,中央第五次西藏座谈会召开之后,其他四省藏区也提出来与西藏自治区的相似性、海拔高、藏族聚居区、经济落后等问题。在当代,因西藏问题的特殊性事关执政党和国家的大局,中央不少领导都提出过西藏的稳定事关国家的稳定,西藏的安全涉及国家的安全,西藏的发展关系国家的发展,西藏的稳定对于国家的改革开放具有重大意义。从1994年第三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在多次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这一表述不断被中央领导们向与会者提出,这既是对西藏工作重要性的战略总结,也是从那时起对西藏工作事关全国大局的预见。西藏工作过去一直被很多人认为是地偏一隅的局部性工作,自20世纪80年代连续发生骚乱之后,国家每每在国际场合出现许多被动局面,凡是涉藏外事,都会出现被动的情况,这对于国家是很不利的。历史地看,西藏和四省藏区向来派系林立,三年一小乱,五年一大乱,从元以来未间断过。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在1959年反革命叛乱被平息之后,才真正实现了三年不小乱,五年不大乱,甚至在1990年之后实现了长达18年的基本稳定,这是在旧西藏不可能达到的。但2008以来的局部暴力事件后,可以说,我们面临的形势错综复杂,斗争尖锐激烈。

中央第五次西藏座谈会召开之后,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西藏工作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事关国家安全,事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胡总书记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结尾句为“努力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通过对60年来历史进程的考察,我认为1959年以来,中央就始终运用国家的权力,动员社会的力量,调动国家和社会资源来处理西藏问题,历经半个多世纪已经形成了一种模式,这就是总体供给模式。实践证明,这种模式是有效的,应当继续施行;同时在国家对西藏未来几十年的维护统一和社会稳定问题上,应该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置于国家整体的边疆战略之中,与时俱进地制定政策和战略,不断完善这套方略,努力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以上的情况介绍中,隐含了一个总思路的重要前提,那就是我国的思想库在当代西藏社会的稳定命题上,应当被包含在当代中国边疆的总体研究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将西藏社会的稳定问题研究好。

二、边疆学的提出与运用

“边疆”一词，最早有“边境”的说法，有几千年的记载，作为“边疆”这个词最早出现于唐诗中。关于边疆最基本的理论中，传统的边疆概念是以地缘为界，传统的理论认为地理边疆的发展、稳定与安全就是国家的发展、稳定与安全。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新的边疆观出现了，执新边疆观牛耳之国家是美国。尽管我国有很长的边境线和广阔的边疆地区，但是新的边疆理论不是中国提出来的。新的边疆观的一整套理论来自于美国思想库百年研究之功力，最终形成完整的新的边疆观和基础理论。“新边疆理论”认为国家整体的发展、稳定和安全不仅仅局限于地理边疆不受到攻击和侵犯，而是要构成全方位的边疆观，要有一个先进的边疆理论来指导国家边疆问题的决策。我们现在谈的西藏问题，90%以上的人会将之局限于地理边疆这一概念中来谈。这种地理边疆的观念，仍然是决策层很多人和学术界很多人固有的认识。新的边疆观中的地理边疆已不仅仅包含在空间上不受外来侵犯，还包括在其他领域中的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和心理安全。例如，西藏“3·14”和新疆“7·5”事件之后，全国各族人民的心理安全都受到了严重冲击，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安全等显然亦在冲击之中。根据新的边疆观，我国的思想库应该尽快拓展国家边疆的概念，以充实我国发展稳定和安全的理论基础，并以这种基础理论来引导或影响决策层，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形势，这不仅仅是学术发展的需要，更是我国特别是中华民族本身民族安全实践的需要。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决策层不少人对边疆和边疆问题的认识仍然是停留在地理区域概念上，这种情况应该尽快改变，因为情势所迫。对照欧美国家的思想库，我们发现，在对西藏问题的研究上，他们集成研究的水平远远高于我国思想库的水平。

几十年来，美国的全球战略与对华战略，乃至具体到对西藏进行渗透和分裂破坏的活动，很早就到达了国策级的研究层次上，而我国最早达到国策级水平的研究是人口问题、计划生育问题，到现在的国策级研究有三步走战略，有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等。而美国国策级的研究，在百年战略的国策当中，始终是如何保持美国在世界的领先地位，始终是保持美国执世界牛耳的地位不受到挑战与冲击，不会由于民族、文化、宗教等等软科学的研究达不到所导致文化安全、心理安全等诸多问题。在美国国策级的研究中，有一个研究就是大边疆思维的研究，一直统领着美国国策级的各个学科的研究，并最终汇集到国策的层面上，包括美国的人口研究也仅是国策级研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最后才汇集到国策级的研究层面上。有了这样的国策思路，如何具体到对西藏问题的研究？在美国国策级的研究中，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边疆，除了地理边疆以外，还有文化边疆、利益边疆、战略边疆，甚至提出了高边疆、外空边疆等观点。那么，这些理论该如何阐释这些概念的核心观点呢？“利益边疆”中有个核心观点，只要美国利益所在之地，都是美国边疆，照此理论，中国西藏自然亦是美国边疆。中国的国策研究里，显然在很多情况下忽略了这一点。美国关于“文化边疆”的国策级研究中认为，世界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各个国家的平行发展关系已被网络格局所打破，各个国家的文化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现象正在被各个国家逐渐接受，而这恰恰是建立美国文化边疆的大好时机。因为根据美国国策级的研究，只要利益所在的文化领域延伸到哪里，哪里就是美国边疆，中国的民族、宗教是美国

肢解、打击、渗透中国的焦点,在这些地方出现的文化现象都可以统纳于美国的文化边疆之中。

通过对欧美边疆战略的了解,许多大师级的人物都有关于边疆理论的阐述。美国的马汉(M. T. Mahan, 1840—1914)、德国的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 1844—1904)、英国的麦金德(Mackinder, Sir Halford, 1861—1947)等均为政治地理学的创始人,而恰恰是政治地理学开创了美国边疆研究的先河。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 Jackson Turner),他总结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独特的边疆开拓活动,进行了理论上的归纳,并将之上升为边疆理论的阐述,为美国的边疆理论奠定了基础,提出了美国边疆战略说。距今六七十年前,一些美国人提出关于美国如何与世界其他国家处理好边疆问题,甚至如何处理好与美国根本不搭界的中国的边疆问题,如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1942出版了一本关于国际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的书,首先界定了美国在世界所有地缘政治中的位置,这个位置一旦界定清楚,中国的边疆即是美国的边疆,可以说这个论点的基础理论在1942年就成立了。再例如,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思想库的领军人物早就预见到宗教之间的文化分歧和意识形态差异,肯定会构成国际动荡,而这是美国维护单边主义的筹码,即利用别国的文化差异来实施离间的策略,破坏这些国家的统一,以保持美国的世界领先地位,此人即是亨廷顿。通过解读他的书,我们知道文化边疆、软边疆、利益边疆国策上的核心人物很早就著书立说。还有基辛格、保罗·肯尼迪、布热斯金、奈斯比特、托夫勒等,这些国策级大师为美国的边疆战略,有很多贡献。比如有个藏学家虽然算不上是国策大师,但在美国国会西藏问题对策咨询上提出三条:“一是文化的、二是种族的、三是生态的”,美国国会立即心领神会,各个组织包括NGO组织也明白了。第一,利用文化的差异,让西藏的文化研究来证明是与中国的其他文化大不相同的,而且美国的策略是让中国学者来证明西藏文化就是与汉文化和其他文化完全不同。第二,种族的。种族本是个生物学的概念,民族的概念才更多涉及文化血统。美国藏学界就此而打的牌就太多了,如移民论、西藏人种西来说等,以及西藏在文化上及其他方面的巨大差异,甚至更有甚者利用所谓民族之间的仇杀对立歧视,如藏学研究中的一项调查研究即是藏族人在不懂汉语的情况下就业率很低。第三,生态上,论证西藏是西天的最后一片净土,是世界的香格里拉,于是作家、艺术家等文化精英纷纷地描述这一香格里拉,因为这片香格里拉不能动,当人们从图片上看到美丽的藏传佛教寺院、纯朴姑娘的笑,于是认为汉人在西藏的活动是摧残性的破坏活动、是令人憎恨的活动……而这些课题也被美国藏学界介绍到中国来,以与中国学者合作的方式,或者干脆给中国学者出题目,由中国学者来完成。而中国的学者十分热衷于去做这些课题。这些情况和态势,其实被美国的思想库的领军人物早就料到了,美国智囊团通过各个学校或者NGO组织把这些题目巧妙地传到了中国国内,通过中国学者来论证他们想说的结论。实际上,祖国大陆的有些学者一直孜孜不倦地论证美国藏学界的课题单子,论证出了西藏是人类最后一片净土、西藏没有也不能从内地移民、西藏的独特文化别具一格与中原无关等论点。

还有藏传佛教,被他们说成是能使人灵魂升华的东西——这往往吻合了现代人们精神压力很大、面对资本大量吞噬人间温情而极端苦闷的心绪。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之后,社会问题肯定会出现,全国各个阶层都有很多人在寻求精神解脱,于是藏传佛教的东渐活动,有正向东渐,有反向东渐,前者为由达兰萨拉向西藏、再向四川、青海、甘肃等

相邻省份，再向中原内地的渗透；反向的是经过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港、台地区把藏传佛教向沿海地区渗透，在海南、广东、福建、四川藏区之外过去曾是汉传佛教盛行的地方，现在都有藏传佛教的寺庙，港澳台的佛教界和政界、商界对藏传佛教十分热情，京津沪的商界、学术界对藏传佛教兴趣浓厚。有人或许会认为藏传佛教东渐不会对国家安全构成什么威胁，它不过是宗教现象而已。但是，别忘了，藏传佛教特别是密宗宣扬的真谛在于服从上师，并且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根本上师，这个根本上师就是达赖喇嘛。有许多撰写有关藏传佛教的书在内地大量流行，讲如何净化心灵，提升灵魂，因此，在各地藏传佛教的活佛受到高度的欢迎，东渐就成了气候，尤其是在西部省市，例如成都，不少人都拜倒在活佛跟前，捐钱捐物或者其他的都有。东渐活动有一本洗脑的书叫《西藏生死之书》，据说在我国大陆已经印了3000多万册，这是由台湾地区的学者介绍进大陆的，它讲的是人死后进入中阴阶段，在导师的指引下，可以看到下一个轮回所进入的层次，有可能高、保持不变或者降低……内容虽然荒诞，但是叙说的过程会蛊惑人心。读过此书，许多人转变信仰，甚至一些高级干部在读了该书后怀疑是否跟党走跟对了，更有大量海归派或者高中级知识分子到西藏去寻求精神的解脱，寻求解脱中阴困惑的精神体验。可以说，由于美国藏学界有人献策，美国最近十几年全方位在软科学、社会科学方面对中国的渗透，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就着了人家的道。十多年来，大陆的藏传佛教寺院在增加，我国关于宗教、文化领域中的不少研究方向被牵着鼻子走，一些知识精英甚至中高级干部思想发生倾斜，信仰开始转变。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说，意识形态领域是反分裂的主战场，此言一语中的。

涉藏错综复杂的形势，除了国内的情况之外，还表现在海外华人的心争夺上。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海外华人天然地站在中华民族一边，是血缘文化使然，曾经使欧美强国的主流社会不寒而栗。到了现在，在美国与达赖集团的精心操控下，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国内决策层、信息研究部门、喉舌部门以及学术界尚未引起警觉，那就是美国相关机构为达赖策划了“亲善、亲民、亲汉”这一策略，从以前达赖集团的中坚分子发表言讲中的每天杀一百个汉人都不够，到达赖集团整体都不发表反汉言论了，到近两年新年贺词言论中提出“亲爱的汉族同胞”，使有些海外华人、留学生和学者倒向达赖。

在达赖集团的智囊团中，有形形色色的欧美学者，有史学、经济学、民族学、宗教学和法学，在美国与其他欧洲国家达成的默契中，近年来，美国和达赖集团的思想库、研究院在如何对付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接触商谈中提出的许多对策，一是要把中央政府置于尴尬境地，二是要使这个宣传的影响到达基层干部群众，让人认可他的主张是合理的，他是处于被动地位的，是弱势群体，是哀兵。自从有了“文化的”对策之后，由于欧美法学家的介入，他们不提主权的问题了，人权的问题偶尔谈一谈，现在谈得最多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如何解决六百万藏人的前途问题”，我们终于发现这是一个中西合璧的政治谋略的产物。因为藏传佛教因明学中有中观辩论方法，由龙树大师所开创，即我无论，以你论为我论，最终我论破你论，我和中央政府接触，我无论，你说按宪法办，我就按宪法办，因此，提出在宪法框架内解决问题。当然，中央政府不会接受。我们当然从中可以看出许多阐释方法是欧式语言，加上藏传佛教因明学的辩论方法。中央政府虽然没有接受，但有些人受到瞒骗，私下里对中央政府不满，人家说按你的办，在宪法框架内办，你还不理，什么意思？他们的这个心理战的效果达到了他们的预期，这是他们文化学、法

学、逻辑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研究所制定出来的策略。

我们在国际藏学研究中还没有拥有该有的话语权和话语主导权。近些年来,欧美的一些经济学家介入到拥护“藏独”的活动之中,他们的做法是大量引用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年鉴或报告,然后运用经济学通用的一些方法,得出符合达赖集团攻击中央的那些言论的结论来,这些报告提供给欧美政要和主流社会之后,被作为国策咨询的证词,长篇累牍地宣读,以证明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都在剥夺原住民的根本利益,都在西藏发展上起到负面作用,都在破坏影响亚洲和世界气候的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其代表人物就是费舍尔,目前他提出的报告和出版的书籍有好几部,受其影响陆续进入藏学研究领域的西方国家经济理论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对此情况,我国经济学界特别是藏学界的经济研究人员似乎无能为力。

三、小结

综上所述,我个人认为,在西藏社会稳定这个重大命题上,“谋长久之策,行固本之举”,一定要进行高度的综合,要实行集成式的研究,要以新边疆、大战略的思维,树立起大边疆的战略,把地缘政治学、政治地理学作为这个学科群的核心,以统领所有能够为中华民族长远利益和伟大复兴而崛起的这一历史过程中服务的学科。起码我们国家在走向新的历史征程的过程当中,在国家崛起、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过程中,在中国应该有边疆学这门学科。具体到西藏来进行研究的话,我个人认为,现在国家的决策部门和研究部门,一定要把边疆治理的问题从一些误区中解脱出来。现在至少在边疆治理上,存在一个重大思路误区,即边疆治理不是区域治理,而是民族(族际)治理。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史学上看出其印迹。封建时代从汉、唐开始,对边疆地区的治理首先是民族(族际)治理,对异民族进行治理,而鲜于区域治理的概念,在这些边疆地区,相对于中原地带,至少存在着民族、文化上的某些不认同。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清朝晚期,已有有识之士、官吏们认识到不是民族(族际)治理的问题,而要进入区域治理,要把这个地区看做国家能够发号施令、国家能够治理的行政区域之一,这才有了赵尔丰等人的“改土归流”,中央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从民族治理转为区域治理。西藏解放以后,毛泽东同志认真研究了历史上的许多经验,他也许已经意识到许多问题不是民族(族际)治理的问题,而是区域治理的问题;民国时期这两个问题是交替进行,但最后还是搞民族(族际)治理;毛泽东时期,用阶级斗争说也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统治的基础理论和法学理论,将民族(族际)治理的问题淡化掉,转为国家的区域治理。毛泽东治理的28年,民族地区确实没有不可控制的大动乱,所有问题都在中央的预料之中,引导其变动,在20世纪70年代,整整10年,民族地区没有出现过反对中央的暴乱事件,那个时候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研判敌对势力想做什么,他们在多大范围和多大程度上能做什么,以及做了之后我们怎么将事情引向有利的方向发展。

研究历朝历代治藏经验,有许多可供借鉴的制度,其中一些仍在继续使用,如“活佛转世制度”仍在继续使用。我们确实需要研究历代中央的治藏方略,治理经验,但更应该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执政党治理西藏的经验,并且从这个经验中挖掘出更深层次上的,能够从学科学术领域上高屋建瓴的、前瞻性、全局性的、有价值的思想。这些经验是值得研

究的，起码应该在内部研究清楚。

对西藏的研究，美国藏学界已经融入了经济学家甚至更多领域的专家。而在我国，很少有经济学家进入西藏的研究领域，而法学家则一个也没有。例如，我们至今还没有一个著名的法学家出来批驳达赖集团有关法学方面的谬论，没有多少法学研究人员写出普及性的文章对谬论消毒。

西藏社会稳定应该是一个多视角的问题，研究问题要达到多个方面集成综合。既有理论的集成综合，也有对策的集成综合。没有理论的集成综合，对策研究通常也会陷入七零八碎的局面，正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面对西方国家智库对西藏问题的研究，看到其涵盖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军事、生态、民族、宗教、边境线等方面，我们要有对策，对策应该也是集成的、战略的研究，并向决策机构提出咨询建议，特别是学术研究也可以从纯学术研究出发，只是要有个潜学术研究前提——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中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即使是纯学术研究，都可以得出有利于中华民族与西方博弈的结论。当然，这里需要国家的投入，从人、财、物等方面都进行投入。当我们从文化角度对外宣传说，每年有一亿多元的投入，有两千名藏学研究人员在从事西藏传统文化的保护继承研究时，欧美的藏学界不知会作何感想。这些数字不及别人的零头，最关键的是研究的层次远远比别人低，且在国际藏学界至今也没有我们在会议、选题、选人上的话语主导权。胡锦涛总书记早就说过，要尽快改变涉藏外事上“西强我弱”的局面，现在看来还有很大距离。

在具体的研究当中，西藏社会的稳定，有一个首要问题，应该从工作研究的层面上提高到国策研究、战略研究和预见性研究上，在学科研究中，社会学研究中的系统论、结构论、突变论、协同论、混沌论等，这些能够起到学科引领式的研究，也可以直接加入藏学研究和西藏社会稳定研究中来，因为这些学科对于西藏社会的控制机理的解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们是研究西藏社会稳定问题的一把把钥匙。其次，边疆宗教领域中的诸多问题是影响国家和社会稳定的热点因素，宗教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文化学，特别是现在研究中极其缺失的心理学，都应该引入到藏学研究中来，现在对西藏研究的对策里面，有与当地的民族群体性心理完全不吻合的决策。例如，汉族是精细农耕民族，两千年来的思维模式是固定下来的，工业化时间不长，工业时代的心理发育不成熟，有强烈的农耕世俗功利主义思想，认为给钱给房一定会让人感恩戴德。但是，如果在民族心理学上没有研究，有的决策是有问题的。民族文化心理学已经发现，包括藏族在内的不少民族，由于长期生活于高寒高海拔地带，有一种无悲剧心理，这是群体潜意识的一种模式，这来自安于轮回的层次。例如，有的农牧民对于给他新建的房子，他并不乐意，因为担心下辈子的轮回层次会降低。关于这种心理有无研究？至今检索不到心理学、民族文化学专家这方面的深刻调研报告，供决策层参考，仍然按照精细农耕民族的思维方式给钱给房，有好的反映也有负面的影响，这需要做有区别的研究。

现在的一些工作思路和做法，强调了各个民族自我的利益认同，也推动了各个利益集团的认同，形成在现实生活中，无数个体组成的群体及其群体利益集团的博弈。我们现在的各个民族的关系，确实有相同的利益联系，比如振兴中华，一致对外；但在内部已经在新形势下变成了各利益集团在相互博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认定的这些民族的聚居区所发生的变化，由于没有深刻的研究，去解读将会发生什么，当这种博弈广泛出现的

时候就会找不到对策。随着形势的发展,可以说这个博弈时代已经到来,中国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会在很长时间内因思想库的无解使决策层束手无策。各民族形成集团进行博弈、各阶层形成集团进行博弈、中央和地方进行博弈。这些博弈实际上贯穿了中国历史的始终,动乱起伏、分分合合都与这些博弈有关。

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早有国家问题的科学解说,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以此为指导,一段时间里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但由于批判了“左倾路线”之后,出现了“新局面”,有的问题开始错综复杂起来。我们确实应该与时俱进,应该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科学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正因为如此,对影响全局的西藏问题,对民族、宗教问题,对边疆治理问题等,都要有深入的很好的研究,提出有质量有分量的建设性意见,以对得起我们的国家,对得起中华民族,对得起子孙后代。

总之,“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中国的边疆问题,包括西藏社会稳定问题,以及四省藏区的稳定问题,绝不是一时一事的治安问题,也不是一个地理局部的社会问题。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任务的要求下,我们确实到了要“谋长久之策”的时候了。

(本文系作者整理自2010年9月7日在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的学术讲座)